

翰林院

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 翰林院与文学

MINGDAI HONGWU ZHI ZHENGDE NIANJIAN DE
HANLINYUAN YU WENXUE

郑礼炬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 翰林院与文学

MINGDAI HONGWU ZHI ZHENGDE NIANJIAN DE
HANLINYUAN YU WENXUE

郑礼炬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郑礼炬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004-9788-2

I. ①明… II. ①郑…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

明代 IV. ①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8118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张玉霞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7.75

字 数 616 千字

定 价 7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漳州师范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序

“回首长干思无限，水风杨柳作秋声。”（王冕《金陵怀古》）伴随着水风秋声，从福建漳州师范学院传来一好消息，郑礼炬将要出版博士学位论文《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欣慰之中，不由得回想起我与礼炬共同关注这一课题的点点滴滴。

那是2003年博士生入学之初，我据程千帆师的教导并结合自己的体会，与礼炬等几位同学谈话。我当时引用了唐代诗人李从远的一首写于九月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摘果珠盘献”（《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全唐诗》卷一百五十），话锋从原来礼佛的角度转而为另一类比喻。我说，研究生的三年学习，要拿出自己最满意的学位论文，好比是摘下你最满意的果实，向老师、学校、国家献上。首先要有目标，志存高远，奋力摘取最满意的果实，不是随手捞一个来交差；二是要有眼光，善于发现树上最好的果实（这就是学位论文的选题）；三是优化知识结构，积聚实力，发挥你最大的潜力，使出你最大的劲，跳得最高，跳得最好，跳起来摘取最丰满、最新鲜、最满意的果实。这个比喻，用意很清楚，要求在三年研究生的学习中拿出最好的学位论文：选题站在国内外学术的最前沿，敢于攻克重点、难点、制高点；学风扎实，资料翔实；富有学术价值与创新意义，是国内外学术园地中收获的最有亮点与特色的果实。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时时处处有一种巨大的诱惑。我们要耐得住寂寞与清贫，坚定信念，把握方向，专心学业，“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在求实中不断开拓，把自己培养成既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不断创新

的人才。记得有句谚语说：“人生无目标，不如一只鸟。人生无追求，不如一头牛。”不做呆鸟与笨牛，既会埋头拉车，更会抬头看路，我们应该有高远的学术理想和追求目标。

礼炬将这些话牢记在心上，在选择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上下了一番工夫。经过一番对文本、文献及研究状况的考察，礼炬将目光集中在明代翰林与文学上。明代掌秘书、著作等事的翰林院，是明王朝重要的中央机构。《明史·选举志二》说：“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翰林又是饱学之士荟萃之地，对明代文学的影响很大。但是，相对于唐、宋等朝代翰林与文学的研究，明代翰林与文学的研究相对比较滞后，特别缺少这方面较为整体、系统性的研究。礼炬将目光瞄准这一点，敏锐地选择了“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当年，南京大学许结教授的一位与礼炬同届的博士生选择了“清代翰林与文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可谓所见略同，都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礼炬在硕士生阶段师从石家宜教授，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向的学位，在古代文论等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跟我读博士学位时，转而关注文化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礼炬苦战三年，终于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后又经过一些修订，交出版社正式出版。礼炬的《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正是朝着他的学术理想和追求目标而努力的，因而，这部专著形成了他自己鲜明的特色。

一 文学与史学并重，文化制度与文学交叉研究，努力把握明代翰林馆阁文学演变的脉络

《四库全书总目·〈怀麓堂集〉提要》指出：“自李梦阳、何景明崛起弘、正之间，倡复古学，于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才学足以笼罩一世，天下亦响然从之，茶陵之光焰几烬。逮北地、信阳之派转相摹拟，流弊渐深，论者乃稍稍复理东阳之传以相撑拄。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

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正、嘉以后，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究渐流于虚矫。虚矫之极，不得不变而务实。二百余年，两派互相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明代的翰林院馆阁文学与七子派的文学构成了明代文学的主体，而在明孝宗弘治年间前七子崛起之前，馆阁文学的创作几乎笼罩了文坛，翰林院作家的创作为天下所景仰，风靡全国，成为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礼炬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包括经、子、史、集四大部类的相关存世文献，将文学与史学、文化制度与文学相结合，而又坚持以文学研究为主，把台阁文学的研究细致化、深入化、系统化，某些结论具有创新性和启发性，对后起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影响。礼炬在《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初步考察了明代翰林院的数次重大制度性变化，明确认识到：较之唐宋两代，明代的翰林院建制更加稳定，所以明代翰林院作家队伍和文学传承更具有共同特征，但是明代中叶以来翰林院的命运与政治斗争紧密关联，亦对翰林院作家文学创作的风格产生影响，具有多样面目。从正德年间始至明末，刘瑾专政、嘉靖初大礼议、张居正改革、万历党争、崇祯改制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导致翰林院的组成人员产生重大改变。特别是在前七子崛起以后，翰林院的馆阁文学受到重大冲击，七子派中的作家部分进入馆阁，改变了馆阁文学的传统，产生了新变的因素，推动了明代文学的演变和发展。

礼炬在《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又下大气力考察了明代翰林院这种文化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指出：明代洪武到正德年间的翰林院文学，时间上的跨度约为160年（从明代建立到16世纪二十年代）。这一时间段的翰林文学，大致代表了此期明代文学的主流。论文考察到从洪武至正德年间的一组数据：翰林学士78人、侍读学士55人、侍讲学士接近60人、南京翰林院掌院20余人，修撰超过100人，编修超过300人，检讨100余人。虽然这些统计数字中有重合的人员，但仍可以反映出翰林院是会聚明朝这一时期作家的渊藪的事实。礼炬在《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努力把握明代翰林馆阁文学演变的脉络，指出：明初一大批作家对建立本朝的翰林馆阁文学进行理论探索，形成一定的共识，经过创作实践，逐渐出现了所谓“台阁体”的雏形。在诗歌创作上，数派并存的明初诗坛逐渐确立以

《唐诗品汇》为宗的学习范本，确立明代馆阁诗歌宗唐的方向；在散文创作上，明代的翰林作家追溯馆阁文学的渊源，从理论上探讨要广泛地学习先秦、两汉、唐、宋散文，逐渐过渡到以“唐宋八大家”散文为学习对象的创作实践。

二 着力把握明代馆阁文学中色彩浓厚的儒家特色

礼炬在《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指出：兼具儒家学者身份的作家是明代翰林院的第一批馆阁作家，所以从明代翰林院建立的时候起，翰林文学即笼罩着浓厚的儒家思想，这种状况一直到成化、弘治年间都没有发生改变。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逐渐改变了道学与文学紧密结合的情形。较之“台阁体”作品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弘治以来翰林院作家创作的文学意味比较强烈，儒家比德、载道的文学观有所减弱，但是终明一代，儒学的思想在翰林院馆阁文学中的地位依然崇高，礼炬在《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较早地注意到这种现象，也注意到以儒学尤其是朱熹理学为一尊的思想对于文学的束缚以及作家们自觉的矫正乃至反叛的创作尝试。

三 认真梳理明代馆阁文学与山林文学、郎署文学之间的关系，明确明代翰林文学的历史地位

礼炬广证文献，细读文本，力求将立论建立在翔实的资料上，在《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以明代翰林文学创作为主体，以景泰十子、前七子为参照系，确定明朝馆阁文学的地位以及它同七子派之间的关系。从文献来看，北宋欧阳修比较早地提出馆阁文学与山林文学的区别，山林文学以枯槁瑟缩为特征，乃仕途坎坷的作家所为；馆阁文学以温润丰腴为特征，是得时位者之所为，二者“有着仙凡之隔”（宋濂《〈蒋录事诗集〉后》）。明代永乐以来的翰林院馆阁文学的发展，一方面不断发展着台阁体的特征，形成馆阁文学的创作高潮；另一方面也出现一批馆阁作家翻新出奇，与台阁体作家产生

很大的风格差异，景泰十子的文学创作就是此期翰林院文学创作的参照系。成化以后，随着“台阁体”流弊渐多，馆阁文学创作万喙一声，在景泰、天顺年间失去活力，但是这个时期翰林作家却很多，作品繁富。翰林作家的风格慢慢地出现了转变。成化至正德时期，李东阳重振翰林院馆阁文学，他和友人、学生组成以翰林作家为主体的茶陵派，这是一个创作上与三杨“台阁体”有一定区别的作家群体，体现为诗歌创作上既宗唐又出入宋元，散文创作上风格比较清峻整洁，注重文学特性。李东阳的文学创作及其理论创辟，于前七子的复古运动，犹如陈涉之于汉高祖，有着重要的过渡性意义。弘治以来，前后七子的文学创作队伍的主力军是一批任职郎署的新科进士，他们看到馆阁文学的弊端，登高振臂，一呼百应，如影随形。七子派的崛起适逢其时，有力地改变了明朝文学的面貌。万历以后，明朝翰林院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复杂的态势，馆阁文学的参照系又是以七子派以及山林（山人）文学为主的，这一点亦当大力考索，大有深入挖掘、可为之处。

四 确立了万历年间馆阁文学传统复归的时间节点，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明代后期翰林院与文学研究的深入

明代万历之前的翰林院作家及其创作情况在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等书中收集、整理，而万历之后的创作分布及其演变，文献上较难考索，加上万历以后，诸派迭起，难以确定翰林院作家文学创作的主流风格，所以要在弘治至万历之间梳理出明代馆阁文学的演变史，是一件较难进行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七子派与翰林作家之间纠结复杂的关系，是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对晚明大学士朱国祯的笔记小说《涌幢小品》的研究，翰林院馆阁文学传统回归的时间基本上可以确定下来，大约在万历三十八年至天启元年（1610—1621）之间，即介于大学士王锡爵（1534—1610）的卒年与朱国祯撰写《涌幢小品》（1609—1621）的时间之间。这一时间点的确立，有利于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期望礼炬能对明代的翰林院文学的演变史作一次完整的研究。

总之，礼炬的《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将翰林文化与文学相结合，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相结合，考据与批评相结合，视野颇为开阔，思

路清晰，分析细致，有理有据，多有发明，颇有新见，将明代翰林文化与文学交叉研究推进了一步。

明代翰林院与文学是值得进一步深化的课题，明清文化制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更是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的领域，学海无涯，任重道远，我与礼炬共勉之！

陈书录

庚寅年“水风杨柳作秋声”之时

前 言

明代洪武到正德（1368—1521）年间的翰林院文学，时间上的跨度约为160年（从明代建立到16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时间段的翰林院馆阁文学，大致代表了此期明代文学的主流。根据黄佐《翰林记》和其他材料所载，从洪武至正德年间，明朝的翰林院有翰林学士78人、侍读学士55人、侍讲学士接近60人、南京翰林院掌院20余人。最能反映翰林院组成人员的是修撰、编修和检讨的人数，修撰超过100人，编修超过300人，检讨100余人，虽然这些统计数字中有重合的人员，但仍可以反映出翰林院是明朝这一时期作家的渊藪的事实。此期明代翰林院作家创作队伍庞大，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在这段时间内，翰林院馆阁文学发展与变化的轨迹，反映出随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翰林院文学创作渐趋没落的趋势。研究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文学，描绘明朝馆阁文学从兴起到衰变的整个过程，加深对明代文学的认识，是拙著的重要目标。

业师陈书录先生循循善诱，结合及门弟子各自的知识结构进行授课，于其不足的地方补正之，于其擅长之所在鼓励之。我们亦遵循老师的教导，努力发展研究能力，关注明清文学研究的前瞻性课题。在多次向老师汇报阶段性学习收获之后，陈先生遂以明代的翰林院与文学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小子不敏，非敢曰能，愿学焉。下面是我选择“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这个课题的最初想法，其中一些构想至今未能很好地完成，仍需要待以时日，焚膏继晷以赴。

一 选题将涉及的研究范围

自唐代始,历朝中央政府机构职官有了翰林院的建制。供职翰林院中的士人随从皇帝充当文学侍从,具有备顾问、承制草诰等职司。宋、元以来的翰林院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北宋设翰林学士院(包括诸馆、殿、阁),宋代的馆阁官员成为当时朝廷储备宰相人才之渊藪,而元代的翰林院兼荷修国史的任务,把国史院并入翰林院,称翰林国史院,在建制上与宋代翰林学士院有所不同,却对明代的翰林院衙门建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代翰林院的建制成为明、清两代非常稳定的制度,延续了500余年时间。

拙著所论的明代翰林院是广义上的,它包括詹事府之司经局、春坊等机构。在明代人的观念中,这些机构同属于“翰林”,例如黄佐著《翰林记》、廖道南著《殿阁词林记》都是这样处理的。虽然宣宗皇帝为各政府机构制定35篇官箴,翰林院与其他机构均有御制官箴,但是翰林院官与詹事府之司经局、春坊等机构^①官员互相迁转,尤以翰林院和国子监、礼部的关系异常密切。翰林官员地位很显要,为明朝士人仕宦的极选。《明语林》:“国朝仕进,以翰林为极选,竞进恐后。”^②“国朝进士一入史馆,即与六卿抗礼,鼎甲无论,即庶常吉士亦尔,二十年间,便可跻卿相清华之选,百职莫取望焉。”^③而翰林选官极为严格,故翰林院实为明朝人才之渊藪。

考察《明实录》和《明通鉴》,在嘉靖(1522—1566)之前,明代翰林院的建制和它在明朝政府的地位与作用呈现出大体定型、相对稳定、稍有变动与发展的过程,其组成人员也比较容易检得。更为重要的是嘉靖之前明代社会相对稳定,虽然在正德(1506—1521)年间国力持续下降,但明王朝还是强盛

^① 按,《明史》卷七十三谓:“本府坊局仅为翰林官迁转之阶。”(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志第四十九,职官二,第1785页,“詹事府”条)本书中如馆阁、翰苑、翰林、史馆、词馆、殿阁、玉堂等均为翰林院的别称,不另出注。

^② (清)吴肃公:《明语林》,黄山书社1999年版,卷四,第554页,“言志”条。按,吴肃公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卒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明诸生,入清不仕,高其气节,仍称故国为国朝。

^③ (明)谢肇淛:《五杂俎》,《明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卷十五,第1833页。

的，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引发巨大的变动，士人的心理和行为不至于像嘉靖以后“士风浇漓”^①。这种状况反映到文学层面上，表现为翰苑文人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主导力量。在洪武到正德之间约160年的时间里，翰苑文人的创作与嘉、隆以后有过在翰林院任职经历的文人之创作仅在数量上作一比较，多寡揭然。

近年来，明代文学的流派研究潮流逐渐带动了对单个作家和作家群体进行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态势，这样的研究路径很有意义。《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是对明代传统的雅文学进行研究的一次尝试。明代的翰林院馆阁文学在以下方面还有待进一步进行研究：

1. 元末文风激发了明初君臣努力建设本王朝“一代之文学”的意图。明代立国之初，明太祖锐意文学，就主张文风须简质，这是朱元璋对元代末年文风不满而树起的口号，也是他试图建立本王朝文学的努力，如在日常行政中惩罚茹太素疏奏冗蔓，初现使用行政命令改变行文格式的做法，又通过褒扬文风简质的作家来助长这种风格。朱元璋的做法有矫枉过正的倾向，对文学自身的发展是不利的。明代皇帝遵循祖制，干涉文学的发展方向，也时有措施，如明宣宗在宣德二年（1427）殿试发策之后明确地对翰林侍臣发出指示说要排斥浮华的风习^②；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制策仍要求“无骋夸辞，无摭陈言”^③，此后历朝多次要求禁止冗蔓文风，以期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设置预期目标，而文学的实际发展脉络和轨迹不仅与明太祖的期望相反，也是其后历朝朝廷所禁锢不了的。要清晰地描绘明朝“一代之文学”的面貌，需要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

① 明人沈德符谓：“国朝士风之敝，浸淫于正统而靡溃于成化。”虽然部分士人如此，但在“嘉靖初年，士大夫尚矜名节，自大札献媚而陈洗、丰坊之徒出焉”。嘉靖中，严嵩柄国之时，“当时谄风滔天”（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明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卷二十一，第2466—2467页）。主要生活在嘉靖年间的何良俊（1506—1573）说：“今仕宦之家，皆积财巨万，犹营求不已。”（《四友斋丛说》，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册，第938页）万历间，顾起元谓：“有一长者言曰：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顾起元：《客座赘语》，《明代笔记小说大观》本，卷一，第1212页，“正嘉以前醇厚”条）士大夫若于义与利之间选择失措，好货观念与士风浇漓，盖同时而有。

② 黄彰健等校：《明宣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卷二十六，第672—673页。

③ 黄彰健等校：《明英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卷八十九，第1816页。

学者投入极大的精力，前赴后继地进行研究。

2. 明代翰林院馆阁文学始终贯穿着浓厚的儒家经学思想。皇帝称内阁和翰林官曰“儒臣”，翰林院的官员时常标榜其儒者的身份。明代的翰林建制与宋代的馆阁制度是有着很大差别的。明朝的文学和儒家经典是紧密结合的，和所谓“积学”挂钩，紧密地服从于皇帝对文学的要求。不仅从明初（1368）到宣德末年（1435）如此，这种观念甚至影响到前七子的作家，《玉堂丛语》载李梦阳曾经说“为曹、刘、鲍、谢之业，而欲兼程、张之学，可谓系小人失丈夫矣”^①。它说明了李梦阳的创作也夹杂着明代儒学的思想。

吴元年初置翰林院时，翰林院的组成人员是由明太祖屡次征召来的儒士充任的，详见《明太祖实录》。明代很多位皇帝继承了太祖的做法，如宣德五年（1430）到宣德九年（1434）间多次提拔国子监学官为翰林院官，褒奖儒臣，此做法一直延续到英宗正统十年（1445）左右。

明代翰林院中的儒家学者很多。英宗时，在内阁的有国子祭酒兼学士萧铉（从1451年12月到1457年1月预机务）、理学家薛瑄（从1457年1月到1457年6月预机务）、李贤等。李贤在内阁（从1457年2月到1466年12月）极受宠信，他性喜读书，好谈性理之学。天顺庚辰（1454）科出身的张元桢（一作桢）博涉群书，尤好探经传，多所独得。当时谈学者数人，各树门户，而张元桢岸然不为下，他撰述有关于《周易》、《四书》、《太极图》等儒学经典的著作。孝宗时，预机务的翰林儒臣有邱濬（从1491年10月到1495年2月在阁）等人。倪谦父子都是翰林学士〔倪谦，天顺元年（1451）任学士，成化元年（1465）起，改掌南院；倪岳，成化十八年（1482）任学士，弘治六年（1493）任礼尚，十年改南京〕，是仅有的“父子光学”（指父子皆为翰林院的学士）的馆阁佳话。这类儒家学者相当多，他们的创作是翰林院馆阁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翰林院中的经学家文学进行研究，是本书的重要内容。

考察《明实录》，太祖、成祖、仁宗、宣宗等朝史料中的“文学”、“词章”、“文章”的含义有一定差异性。这些词语的含义值得进行探讨，如《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元年的一段皇帝赐敕语，其中的“文学”等同于“学问”；《明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0页，“品藻”条。

英宗实录》人物传记中论张瑄时谓“文章非儒臣所长”；正统七年（1442）权谨卒，《明英宗实录》也说“文学非其所长”^①。仔细地区分这些词语语义之间的差别，确定各自的含义，对于研究儒家思想之于明代翰林院馆阁文学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意义。

3. 明成祖时常把汉、唐、宋三个朝代并提，其侍臣指出超越这三个朝代而致三代之治是成祖的目标。而到了宣德年间，明宣宗对于前代的治隆，仅提到汉、唐。他认为宋代积弱，不能与汉、唐并提，更指出其积弱原因，系宋代变更政治上的成宪所致，不值得本朝歆羡。明宣宗的看法标志着明代统治者产生了轻视宋朝的思想，他们否定宋代历次改革变易成宪的正当性，从而在政治、文化诸领域轶越两宋，开启全面复古和模拟的道路。这种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有明一代君臣的共识，影响到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翰林院馆阁文学乃至一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

明代翰林院馆阁文学的发展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成祖要求翰林院庶吉士为文必驱班、马、韩、柳之间，而永乐间开始形成的三杨台阁体却与学习以欧阳修为主的宋六家很有关系。在明仁宗的指导下，三杨等台阁大臣体会欧阳修文章中体现的忠爱思想。在宣宗朝，皇帝仍然时常读欧阳集，突出的也是欧阳修的忠君思想。可以说，在制度上，明代翰林院是在沿袭元代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在古文创作上，却师范欧、苏、王、曾等宋代文学家，这是一个探索复古和模仿对象转变、确定的过程。明代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排斥宋诗，仅以唐代诗人及唐代以前的各朝诗人诗作为摹本。馆阁作家和七子派的成员，不约而同地坚守这一共识。

4. 各阶段之地域文学研究。从翰林作家的籍贯之地域分布的角度来研究明代翰林院馆阁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明初，武将多出于濠、泗之地，而闽、浙、吴中等地区则成为文臣的渊薮。福建的闽中十才子在永乐年间有四人进入翰林院：高棅（典籍）、王偁（国史院检讨）、王恭（典籍）、王褒（修撰）。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的闽人也很多，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记载，宣德间闽地及第者很多，举业很发达，这使得闽诗派的诗学主张在翰林乃至整个明代都产

① 黄彰健等校：《明英宗实录》，卷九十，第1823页。

生了深远的影响。考之《千顷堂书目》，永乐年间在翰院中任职留有别集的、为该书著录的福建士人也很多。可以设若干专题来探讨之，如明初翰林院馆阁文学与两浙文学、明初闽中文学创作与理论对翰林院馆阁文学的影响、明代江西作家与翰林院馆阁文学、翰林院中吴中作家的文学取向等。

5. 洪武、永乐年间经过科举进入翰林院的士人留下的别集不多，由其他途径进入翰林院的士人在创作上留下的作品更多，这说明此期文学的主导文风、作家队伍仍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明朝自己培养的翰林作家其创作还处于发轫阶段。《玉堂丛语》言：“词林故华贯，国初惟才是畀，不拘身格，后独以一甲进士若庶吉士充之，他有与者，辄摈不相容，而其途狭矣。”^① 在正统、景泰年间，经科举进入翰林的士人留有较多文集。据《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的按登科编年之明代别集，清楚地显示出弘治年间曾为庶吉士的士人，在六部和内阁任职的很多，著述繁富，它说明了弘治数科培养的庶吉士对翰林馆阁文学创作乃至此时全国文坛繁荣的意义，而英宗年间有数科不选庶吉士，则连这些年份科举出身的文人的著作数量都很少。所以，明朝翰林院的庶吉士制度对于翰林院作家队伍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庶吉士制度对于明朝中央政府吏部、礼部、国子监以及内阁等部门官员的培养都有重大的意义。《明史》卷七十：“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1458），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② 虽然散馆之后，多数庶吉士不能留馆阁，但士大夫皆以庶吉士的身份荣耀终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庶吉士身份的作家之创作亦可以看做馆阁文学的辐射与延伸，足见翰苑馆阁文学对明朝文学创作的影响力。

6. 翰林馆阁文学在三杨台阁体后，它的发展有待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怀麓堂集〉提要》：“自李梦阳、何景明崛起宏（当作弘，清人避讳改字）、正之间，倡复古学，于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才学足以笼罩一世，天

^① （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97页。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第1701—1702页。

下亦响然从之，茶陵之光焰几烬。逮北地、信阳之派转相摹拟，流弊渐深，论者乃稍稍复理东阳之传以相撑拄。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正、嘉以后，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究渐流于虚矫。虚矫之极，不得不变而务实。二百余年，两派互相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平心而论，何、李如齐桓、晋文，功烈震天下而霸气终存；东阳如衰周弱鲁，力不足御强横而典章文物尚有先王之遗风。殫后来雄伟奇杰之才，终不能挤而废之，亦有由矣。”^①李东阳已经认识到台阁体的弊端而矫正之，到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继起，在诗文创作上改变方向，与台阁体趣味不同。这两股文学发展潮流之间的关系需要加以辨析。

7. 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中的翰林作家之创作成就及其与前七子的关系。

鉴于以上诸方面问题的解决均未见诸前贤著述，均为未知领域，属于发轫始作之研究，对于明代文学的研究具有意义，故当竭力从事，期望有所收获。

二 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兹简介如下，当有挂一漏万之虞。

关于明代文坛上的作家，《中国历代文学家评传》对明代重要的作家有所介绍，但仍然有大量的不足。北京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的大型丛书《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明代文学研究》卷在收集国内明代文学研究成果上做了很多工作，可以检索相关篇目，但它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研究成果基本不收录。黄仁生撰写的单篇论文《二十世纪明代文学研究》（《复旦学报》2001 年第 2 期）所介绍的情况更为详尽。

关于明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国内有马积高著的《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等，较新近的专著有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等；海外明史研究成果，有美国牟复礼和英国崔瑞德合著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中国台湾吴智和主编的《明史研究论丛》（台北大立出版社 1982 年版）、陶希圣和沈任

^①（清）永瑔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1965 年版，卷一百七十，第 1490 页。